数字人文视域下历史档案资源分析利用实践——以《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为例

李少建[1,2] 余敏[1] 罗娜[1] 张佳欣[1] 王文斐[1] 梁继红[1,2]
（[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2]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目的/意义] 历史档案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固化信息，是国家文明延续、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做好历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方法/过程]** 在数字人文研究视域下，对《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两部历史档案中康熙帝问安数据进行人工标注，并从标注的数据结果入手分析康熙帝孝治天下的具体实践。**[结果/结论]** 用数字人文的方法挖掘分析《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两部历史档案的内容，可为数字人文在历史档案开发中的运用方法提供参考借鉴。数字人文的运用将为未来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历史档案;帝王问安;孝治文化;文本分析;数字人文
分类号： G275.1

1 引言与研究回顾

历史档案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固化信息，是国家文明延续、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它是中华民族千年发展的见证者，是历史文化价值的富矿区，在当今数字技术发展迅猛的信息时代，如何利用好数字人文技术与方法充分挖掘和发挥历史档案的内容与价值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当前学界对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源介绍型或者利用思路型的研究，如石山等人对湖北省辛亥革命历史档案资源的分布及利用情况进行了介绍[1]，马克锋提出回族历史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重要意义[2]，王玉龙分析了美国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网络开发与利用对我国的启示[3]等。但最近几年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开始陆续有人利用数字人文的技术与方法开发利用历史档案资源，如高淞，王向女提出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模式[4]，王阮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的相关研究[5]，贾琼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开展了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研究[6]。

实录与起居注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源，是历代史官修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在历朝历代的实录与起居注中，属清朝的保存最为完整齐全。数字人文在国内兴起后，《清实录》也进入了数字人文学者的视野。2008 年，朱政吉通过对《高宗纯皇帝实录》进行人名识别，以“权臣”为主题词，对以“权臣”为首的人脉关系进行分析并且以“年”为单位找出共现人物，建立每年人脉权重网络，比较了乾隆时期权臣中心性差异度、权利团体的差异程度。[7]2011 年，陈品谚将《清实录》进行切分、标记，后以中国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THDL）为模型构建了《清实录》查询系统（QSDL），并通过计算机计算校正了《清实录》存在的 12 处日期错误。[8]2013 年，高欣恺利用 Text Mining 技术、Google Map API

作者简介： 李少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E-mail：lishj27@ruc.edu.cn；余敏，罗娜，张佳欣，王文斐，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数字人文专业硕士生；梁继红（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及 Timemap 时间轴工具，建立了一个历史地理资讯系统（HGIS），并选择《清实录》中“康熙朝”“乾隆朝”的日期、标题、内文的数据来进行系统训练，通过词库式地名辨识，找出《清实录》与空间数据库中重合的地名。[9]

整体上来说当前历史档案资源开发的相关研究主要多见于资源介绍型或者利用思路型或者工具开发型，利用数字人文的技术与方法针对具体某类历史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实践并不多。而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清实录》研究多用于解决人、事、时、地、物标注与提取的问题，对于《清实录》背后的语义知识挖掘力度尚有不足，《清实录》真正的研究价值还有待发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数字人文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以康熙帝问安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对《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做更深入的知识挖掘与文化分析。

2 问安与帝王孝治的文化内涵

“孝”是中国传统血缘宗法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核心命题。先秦典籍几乎都对“孝道”“孝行”内容有所涉及，如《礼记》是我国最早把“孝”和政治联系起来的古典制度文献，它强调“孝”齐家治国的重要性[10]。《孝经》则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1]，它代表了儒家对孝的理解和推崇。自汉朝独尊儒术，提出“以孝治天下”后，至清朝两千余年间，几乎历朝历代都把推行孝道作为基本国策之一。清朝社会沿袭旧制，入主中原后便广泛学习先进儒家文化和道德，继续推行“以孝治天下”。清统治者们深知孝治统治的重要性，犹擅把孝和国家统治实践结合起来[12]。他们既从国家政策层面积极倡导，如《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康熙曾谕大学士等：“兴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道为先。节妇应加旌表，孝子尤宜褒。八旗岂无孝子，其居官殷实者，行孝乃分内事耳。贫人克尽孝道，诚为非易。如有身处贫寒，能尽孝于父母者，察明奏闻”。又以身示范，作孝亲表率，由此推及大臣、百姓，使整个社会形成了浓厚的重孝氛围。问安就是清统治者们躬身孝行、侍奉亲祖的重要体现。

问安之礼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礼记·曲礼》：“凡爲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13]，即大凡为人子女的规矩是：冬天要留意父母亲穿的是否温暖，居处是否暖和。夏天，要考虑父母是否感到凉爽。每晚睡前要向父亲母亲问安；早上起床，一定要先看望父母亲，请问身体是否安好。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对此注解为“定，安其牀衽也。省，问其安否何如”[14]。至今“定省”一词也意味子女早晚向亲长问安。《礼记·文王世子》也记载有：“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乃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15]。后来，问安视膳便指古代诸侯、王室子弟侍奉父母的孝礼。《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开成二年》记：“温谏曰:太子当鸡鸣而起,问安视膳,不宜专事宴安”。直至明清，问安视膳一直都是皇帝们继承重孝传统、举敦孝悌、彰显自身仁孝的重要活动。明朱元璋称帝伊始,诣太庙自称“孝子皇帝”，并颁布《慈孝录》，荐举孝廉。《大明实录》对帝王问安活动也多有记载，如《大明仁宗昭皇帝实录》记：“殿下正位以来，问安视膳，孝行配于前王，赞政施仁令，誉达于天下，合天心而郊庙社稷之俱享，得人而讴歌，朝觐之攸同”。到清朝，皇帝问安行为的制度化、常例化趋势愈发明显。《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16]记：“慈恩罔极，祇深爱戴之忱，盛德难名，益肃尊崇之典，泽流寰海，喜溢宫庭。钦惟圣母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皇太后，道合坤贞，功侔干始，茂膺纯嘏，既锡祚于藐躬，特简贤媛俾协襄乎内治，问安视膳，莫申养志之微诚。

显号隆仪，用表徽音之备美”“祖孝事皇太后，晨兴问安，长跽受教隆宠勲旧，敦睦懿亲”。依据本文对《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问安统计来看，康熙在位期间问安其祖母昭圣太皇太后、生母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达四千余次。从康熙开始，皇帝问安亲祖成为其生活不可缺少的孝行常例。《国朝宫史》中也明确记载："我皇上躬昭醲化，教始宫庭。首敦孝治，为天下先。祇事圣母，问安视膳，怡怡愉愉。举觞庆以承欢，躬彩舞而介祉。仪则本乎天经，动容彰夫至德。猗欤盛哉！莫有加于是矣。乃观夫日用之恒，起居之节，躬蚕示其则”。可见，“以孝治天下”依然是贯穿清朝政治统治的核心意识形态，“祇事圣母，问安视膳”则是帝王孝亲孝治最直观和具象的表达。清朝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孝治政策也到达了顶峰，官僚制度、法律法条、教育制度、养老政策等中处处都透露着孝治思想，这也是学术界清朝“孝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问安是清朝皇帝践行孝道的重要体现，在《清实录》与《起居注》中也有着详实的清帝问安记载，但目前界内却缺乏这类研究，问安背后所体现的孝治思想还需要深入挖掘。

3 数据处理的框架构建与文本标注实施

康熙帝作为“千古一帝”，是清军入关之后的第二个皇帝，他将清朝从武力取天下转变到了和平建国时期，为后续统治者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清史中，有“康雍乾盛世”之说，启功先生就认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数康熙帝在位时最为强盛，此时各项国家制度都趋于完善。因此，本研究选取《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为样本，对其问安情况进行计量和数据挖掘，尝试从一朝之史窥探国之孝治，为清朝孝治文化研究提供突破传统研究路径的数据建设和分析框架。

3.1 康熙帝问安数据来源

为方便读者阅读助力清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依据其馆藏实录藏本（兼辅以少量珍贵存世藏本），与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大清历朝实录》全文数字化工作，最终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共计 4447 卷。数字化后的《大清历朝实录》繁体文本和原文件图像页并存，二者既可独立浏览，亦可对应切换，除按编辑体例编有原文本卷次目录外，另编有精确到月的时间索引，便于读者查找检索[17]。除《清实录》外，书同文数据库还提供《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的数字化全文。为较全面完整地认知康熙朝皇帝问安行为，本研究以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提供的《康熙起居注》（54 卷），《康熙实录》（300 卷）数字化全文为主要数据源，对康熙朝问安数据进行标注和处理。

3.2 康熙帝问安数据采集框架

在标注问安数据之前，团队成员先设计了问安元数据的框架，根据原文的内容，设置了问安时间、问安地点、问安对象、问安原因、问安情境以及记述情境的原文和记述问安的原文等 7 个维度对《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做了全文的数据标注。时空分析是数字人文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因此研究选取问安时间以及问安空间作为标注项，以窥探康熙问安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并基于此开展相关分析。由于康熙朝共有三位不同的问安对象，一为康熙帝祖母昭圣太皇太后，即孝庄文皇后；二为康熙帝生母慈和皇太后，即孝康章皇后；三为康熙帝嫡母仁宪皇太后，即孝惠章皇后，且慈和皇太后与仁宪皇太后两宫并尊，又称圣母皇太后，因此需要根据具体问安情况区分不同的问安对象。另外在《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中有时会记载康熙帝为何前去问安，如节日祝寿或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生病等情况，团队成员标注了问安原因。为更详尽的把握康熙帝问安情景，即问安之日其正在处理的事件，事件与问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团队成员参考《康

熙实录·修纂凡例》《皇朝经世文编》《清实录北京史资料辑要》等资料以及结合相关清史研究专家的建议，对《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所载事件进行归纳梳理，构建起较为全面的清实录事件分类体系，以便为后续事件数据标注和统计分析提供基础。同时为便于后续的分析，将对应的问安原文以及情境原文也一一进行了对应的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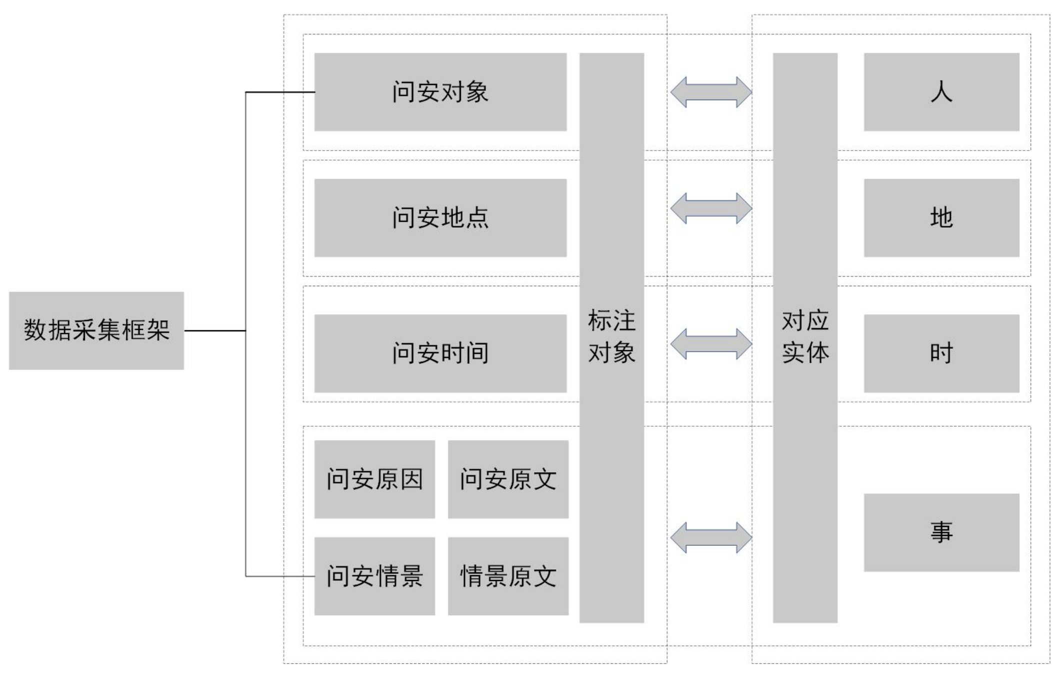


图 1 康熙帝问安数据采集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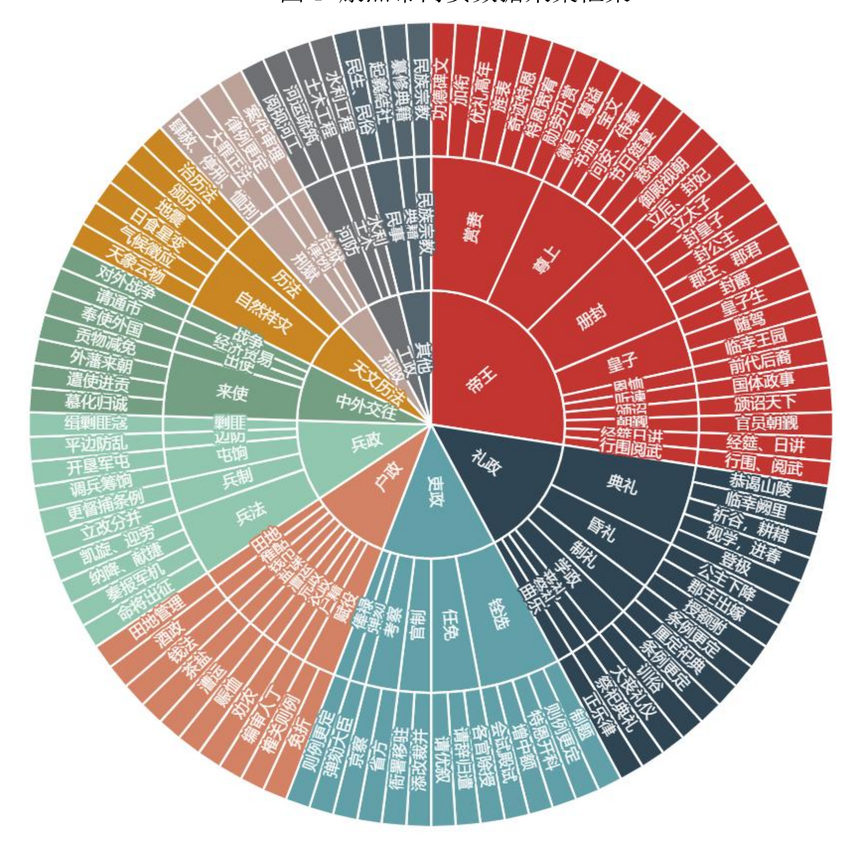


图 2 《清实录》事件分类体系

3.3 康熙帝问安数据标注

基于以上构建的康熙帝问安数据采集框架以及事件分类体系，在清史专家的指导下，由 5 位团队成员对书同文数据库中的《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文本进行手工标注。5 位成员中有 1 名为档案学（数字人文方向）博士，其余 4 人均为数字人文专业硕士，均具有《清实录》文本标注经验和古籍信息挖掘研究背景。

表 1 问安数据标注格式

标注格式	问安原文	问安时间	问安地点	问安对象	问安原因	问安情景	情景原文
说明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方便校对复查	便于问安时间维度的分析	便于问安空间维度的分析	便于问安人物维度的分析	便于后续问安情境维度的分析		便于问安情境的核对校准
格式	原文	康熙某年-干支纪年-月份-日	文中问安地点	文中问安对象	常例，因病，节日等	据“清实录事件分类体系”	原文
示例 1	己巳，上诣太皇太后宫问安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月-十一日己巳	太皇太后宫	太皇太后	常例	边防	……定南将军希尔根，败贼于抚州四十里塘堡地方……
示例 2	乙亥，上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问安	康熙十四年-乙卯-正月-十六日乙亥	太皇太后宫	太皇太后	常例	册封	……封王嗣子李焞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国王妃……
	乙亥，上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问安	康熙十四年-乙卯-正月-十六日乙亥	皇太后宫	仁宪皇太后	常例	册封	……封王嗣子李焞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国王妃……

3.4 康熙帝问安数据整理与统计

团队成员在得到以上问安数据后做了进一步的数据整理，主要是问安时间、对象、地点的对齐等。问安时间方面，清实录中用的是天干地支纪年表示时间，月虽能识别，但日的记述仅有天干地支，无法有效判断具体时间，因此团队成员对照《康熙起居注》中对日的记述以及结合天干地支纪年的推演，完成了《康熙实录》中问安记录时间上的辨识。在此基础上，分别统计出年，月，日三个层次的问安情况。问安对象方面，前文提到，康熙朝共有太皇太后、皇太后 3 位，而清实录和起居注中对问安对象的记述均为太皇太后，皇太后而未作区分，因此团队成员根据历史实际情况，将 3 位太皇太后、皇太后分别进行了具体对应，分别表示为昭圣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仁宪皇太后（孝惠章皇后）、慈和皇太后（孝康章皇后），以便述清问安对象。问安地点方面，《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两部文献中对问安地点的记述有太皇太后宫、皇太后宫或者太皇太后行宫、皇太后行宫以及具体宫殿名等情况。为便于统计，团队成员将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或者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宫等概述地点结合史实一一对齐成慈宁宫、五龙亭、紫光阁、澹泊爲德行宫、镜峰、谦尊堂、西宫、闲邪存诚殿、九经三事殿、露华楼、雅玩斋等具体地点。经查阅相关材料发现，以上地点表述部分存在包含关系，“淡泊为德”“谦尊堂”“镜峰”，均在畅春园西花园的“皇太后宫”内。“闲邪存诚”“九经三事”“露华楼”“雅玩斋”等处，虽在畅春园里但不在“皇太后宫”内。[18]此外实录中繁体异体简体兼有，如澹泊为德，澹泊为德，澹泊爲德，淡泊为德，镜峰，镜峯，宁寿宫，宁寿宫，宁寿宫，寧寿宫，寗寿宫，寗寿宫等，字体写法不同但含义一致，不便计算机识别，团队因此进行了字体对齐处理。

经统计，从《康熙起居注》文本中得到问安数据 3545 条，《康熙实录》文本中得到问安数据共计 3268 条。在标注过程中发现，虽然起居注是实录修纂的重要来源，但实录与起居注在记录国朝史事上并不完全一致。为得到最为完整的问安数据，本研究对两个文本中的问安数据进行合并，以《康熙实录》为基础，以时间为参考线索，将《康熙起居注》中记载的有而实录中未曾记载的数据进行整合，最终得到 4434 条问安数据。

表 2 问安月份分布表

问安月份	太皇太后问安频次	皇太后问安频次	合计
元　月	191	360	551
二　月	147	177	324
三　月	149	276	425
四　月	156	251	407
五　月	158	209	367
六　月	135	146	281
七　月	159	135	294
八　月	153	83	236
九　月	187	173	360
十　月	173	219	392
十一月	135	207	342
十二月	165	193	358
闰月合计			97
合　计			4434

4 康熙帝问安数据分析

4.1 康熙帝问安时间维度分析

4.1.1 时间维度之问安年份

从问安的年份来看，问安次数总体呈现先升再降的趋势，前期升的原因主要在于康熙逐渐重视孝治，在当时推出一系列孝治政策，如康熙九年十月，颁布《圣谕十六条》。[19]不过，康熙并非清朝孝治之始，顺治十三年（1656 年）清廷就已经出版了由大学士蒋赫德攥写的《御定孝经注》，大力促进《孝经》的传播与推广，明确表达朝廷孝治天下的理想。[20]康熙承顺治之治，命儒臣叶方蔼等续修《孝经衍义》。康熙二十一年（1690），完成《御定孝经衍义》100 卷，康熙亲序于二十九年（1690）。这部由朝廷主持编纂的《御定孝经衍义》，强调《孝经》的政治教化功能。清初几位皇帝多次御注《孝经》以颁布天下，配合着清廷对家族组织、宗法秩序的支持，《孝经》成为帝国教化与统治意识形态的基石。此外，康熙帝本人在践行孝治方面也以身作则，对其祖母孝庄文皇后克尽孝道，竭力为全民之典范，以落实孝治天下的统治。[19]如康熙熙十一年年正月，孝庄太皇太后“身疾特甚”，孙子玄烨便亲陪伴祖母前往赤诚汤泉（位于今天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疗养。综上观之，康熙十一年问安的频次达峰合乎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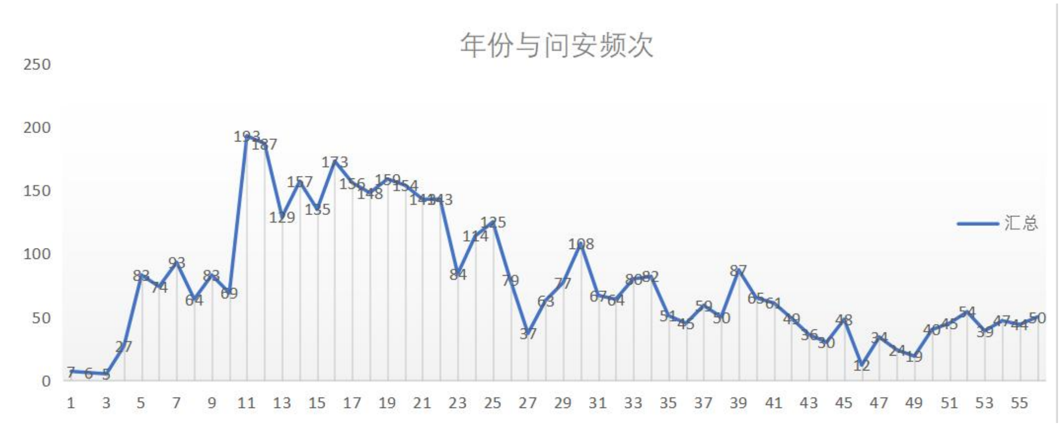


图 3 年份与问安频次

4.1.2 时间维度之问安月份与日期

从问安的月份与日期频次分布来看，除去各年闰月的问安频次，每月的平均问安频次在 361 次。从月份与问安频次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正月作为岁首，问安频次为最高，达到 551 次。古人对岁首非常重视，立春时节要举行祭春神、立春幡、祭太岁等一系列活动，敬天法祖，以表对新岁的祈福。问安在此特殊情境下，被重视程度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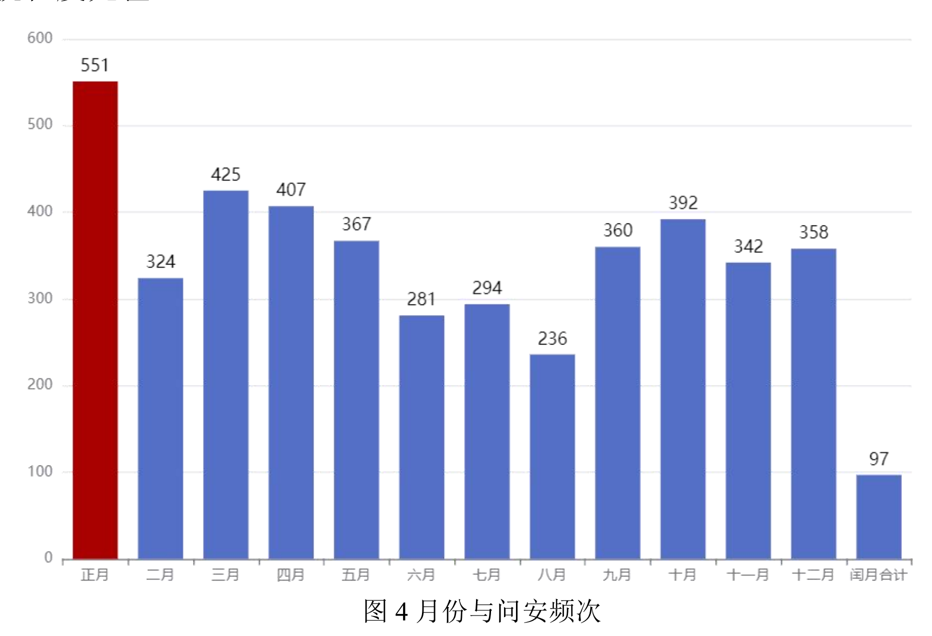


图 4 月份与问安频次

从具体的问安日期统计数据看，每月初一日与十五日，也就是每月的朔日与望日，问安的频次最高。其中朔日问安最多，达 219 次，望日次之，有 181 次，而日平均问安次数仅有 146.4 次。朔望之说本源于古人对月相的观察，古代通过对月亮的观察来记录日期，指导生产生活。朔日为每月初一日，望日为每月十五日（或者十六日），从朔日到望日，是记录月亮从新月到满月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这两天格外受重视。古代在朔日这一天，君主须视朝，群臣贺朔。如《东周列国志》记载：“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皇明书》亦载：“朔望，具衣冠带再拜，焚香献茶而退。”[21]此外，清代的家祭也是如此，“月朔望日，献茶，然香镫，行礼告事”[22]；“每月初一、十五，焚香献茶（朔望）”[23]。



图 5 月份与问安频次

同时从现代自然科学上来讲，朔日，即当天月球恰好运行至与太阳黄经相等，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望日，地球处于太阳与月亮之间。朔望二日的月球处于离地球最近的状态，也是月球对地球引力最强的时候，容易引发一些自然祥灾，所以古人认为这两日不详，往往会在这两天开展一些特殊的活动以祈福求安，因此朔望二日的问安频次远高于其他日期。此外，清代帝王大都是在每月朔望日和四月初八的浴佛日抄写佛经，称“御笔写经”，一则可以为父母祈福，二则可以修身养性，三则寓意国运绵长。故宫图书馆收藏的御笔写经包括康熙三十七年（1698）抄写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乾隆九年（1744）抄写的《御书黄庭内景玉经》一卷等。清朝还有朔望宣讲圣谕的制度，据嘉庆实录卷二百二十二记载：“谕内阁、御史周钺奏、请复讲约旧例、实力奉行、以敦风化一摺。顺治年闲、钦定六谕文。康熙年闲、颁发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复颁发圣谕广训万言。通饬各直省地方官。于每月朔望、剀切宣讲。”可见，在朔望二日开展问安等行孝活动的情况十分普遍，康熙问安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

4.1.3 时间维度之问安间隔

从问安的时间间隔上来看，通过对 4392 条问安数据的分析发现，问安间隔在 3 天内的数据共有 1886 条，约占总问安数据的百分之 43%。其中问安间隔为 1 天的有 789 条，在所有问安间隔中是占比最多的。问安间隔为 2 天的有 530 条，问安间隔为 3 天的有 567 条。在清代，问安活动被正式成为一种制度是在乾隆时期。乾隆是清朝著名的孝子皇帝，侍母极孝，“至凡遇万寿大庆,必躬自起舞,以申爱敬;每当宫廷侍宴,必亲制诗画,以博欣愉”[24]。乾隆七年编纂的国家仪制政令类书《国朝宫史》对于问安礼仪制度有详细记载：“寿康宫问安仪，皇太后宫问安之礼。每间二三日，皇帝夙兴常服乘舆诣皇太后宫，降舆由寿康左门步入至皇太后暖阁前，宫监传奏，皇帝进暖阁跪敬问起居，皇太后赐坐，皇帝兴进至御榻左一叩坐，赐茶，皇帝叩受饮复叩如初，皇帝奏对毕辞出乘舆还宫”。由此可见，乾隆时期皇帝向皇太后问安的频率为“每间二三日”，地点为“皇太后宫”，行礼为“跪礼”，问安内容为“起居何如”。说明到乾隆时期问安已经成为一项制度性的礼仪，不仅有对问安时间的具体规定，更有十分详尽的问安路线和问安

流程的要求。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康熙时期的问安间隔已经基本趋近于乾隆时期寿康宫问安仪规定的“每间二三日”，处于该仪制规定的前期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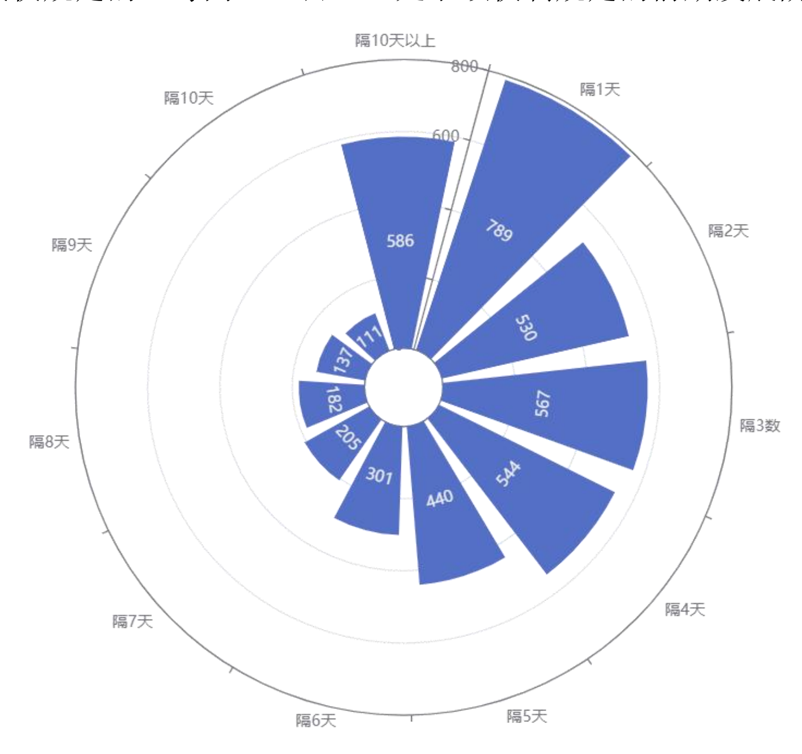


图 6 问安间隔天数与问安频次

4.2 康熙帝问安空间维度分析

从问安空间维度来看，问安地点基本上固定在太皇太后宫和皇太后宫。但具体太皇太后宫和皇太后宫所指在清史研究中尚有争议，只因太皇太后宫和皇太后宫这二者之名是从居住对象的角度称呼的，而实际上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具体居住过的地方显然不止一处。如寿宁宫为皇太后宫，但并非每次提及皇太后宫均指寿宁宫，因此在统计整理时，团队成员仅把有空间大小区分的问安地点进行归类，如澹泊爲德属于畅春园，而不对皇太后宫等具体所指进行区分。通过整理发现有两处康熙帝问安的重要地点，一为宁寿宫。宁寿宫落成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是为康熙帝奉养母后皇太后（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而建[25]。《康熙实录》[26]有载 “ 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上谕大学士、内务府总管，朕因皇太后所居宁寿旧宫，历年已久，将建新宫，比旧宫更加弘敞辉煌，今已先成，应即恭奉皇太后移居。” 该宫不仅成为康熙帝问安的重要场所之一，其建造目的本身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尊长的孝顺。据《康熙会典》载：“慈宁宫在武英殿后以奉太皇太后，宁寿宫在慈宁宫西北以奉皇太后”。《清史稿·后妃传》也有类似记载：“帝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诸宫。”二为畅春园。自康熙二十六年营建清代第一座离宫畅春园起，仁宪皇太后及其他皇室成员即经常移驻离宫，起居注中多处记载了康熙帝在畅春园中向皇太后请安或陪同皇太后游赏的场景[28]，如康熙四十一年五月 “初六日丁亥，辰时，上御畅春园内澹宁居聽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上诣澹泊为德行宫问安”。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具体问安地点虽出现了 16 种表述，但实则大多都在畅春园内。畅春园原址是明朝明神宗的外祖父李伟修建的“清华园”。1684 年，清朝康熙皇帝南巡归来后，利用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在它的旧址上仿江南山水营建畅春园，作为在郊外避暑听政的离宫。畅春园落成之后，康熙帝每年约有一半

的时间在园内居住，据统计，康熙皇帝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园内寝宫清溪书屋，前后 36 年，每年都在畅春园处理朝政。36 年间累计居住畅春园 257 次、3800 余天，年均驻园 107 天，最短者为 29 天，最长者为 202 天。[29]从康熙帝所撰《御制畅春园记》看，兴建该园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政务之暇，修养身体，怡情养性。康熙帝自言："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其二，奉养皇太后，如康熙帝所称："扶舆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一般而言，康熙帝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奉皇太后来到畅春园度过上元节，并赐宴外藩王公大臣；二月份，巡视京畿后再回到畅春园；四五月份启程巡幸塞外或避暑山庄，九十月份返京后仍驻畅春园，直到年底才会回宫过年。[30]无论是宁寿宫还是畅春园，康熙帝在建造之时均有相关文字记载，其建造目的含奉养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之意，是康熙帝施孝行的重要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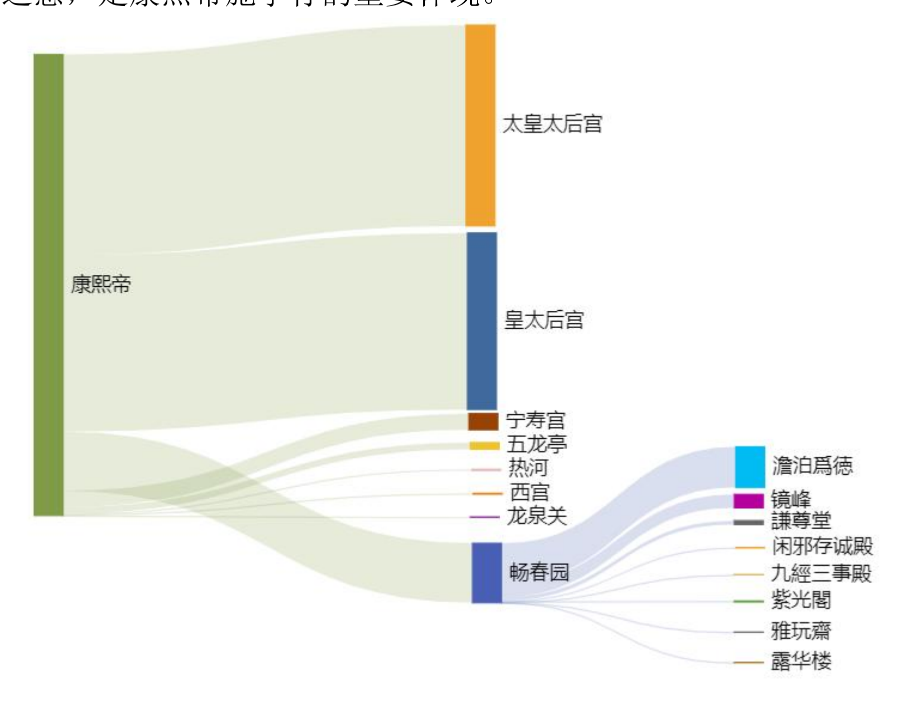


图 7 康熙帝问安地点分布

4.3 康熙帝问安人物维度分析

总体而言，康熙帝对祖母昭圣太皇太后、生母慈和皇太后、嫡母仁宪皇太后的问安频次，以问安祖母昭圣太皇太后次数最多，达 1974 次；问安嫡母仁宪皇太后次数次之，为 1627 次；问安生母慈和皇太后次数最少，仅有 5 次记载，原因是慈和皇太后于康熙二年崩逝，年仅 23 岁。从此仁宪皇太后成为康熙帝唯一的母亲，这也让其倍加珍惜这份母子情谊。《康熙实录》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曾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躬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康熙继位后，每年去拜谒祖陵，必然会带着太皇太后和太后。《清史稿》云：上奉太皇太后谒孝陵，幸盛京，谒福陵、昭陵，出古北口避暑，幸五台山，皆奉太后侍行。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陪太皇太后去盛京，去避暑，以及去五台山，几乎都一同带太后前往，以表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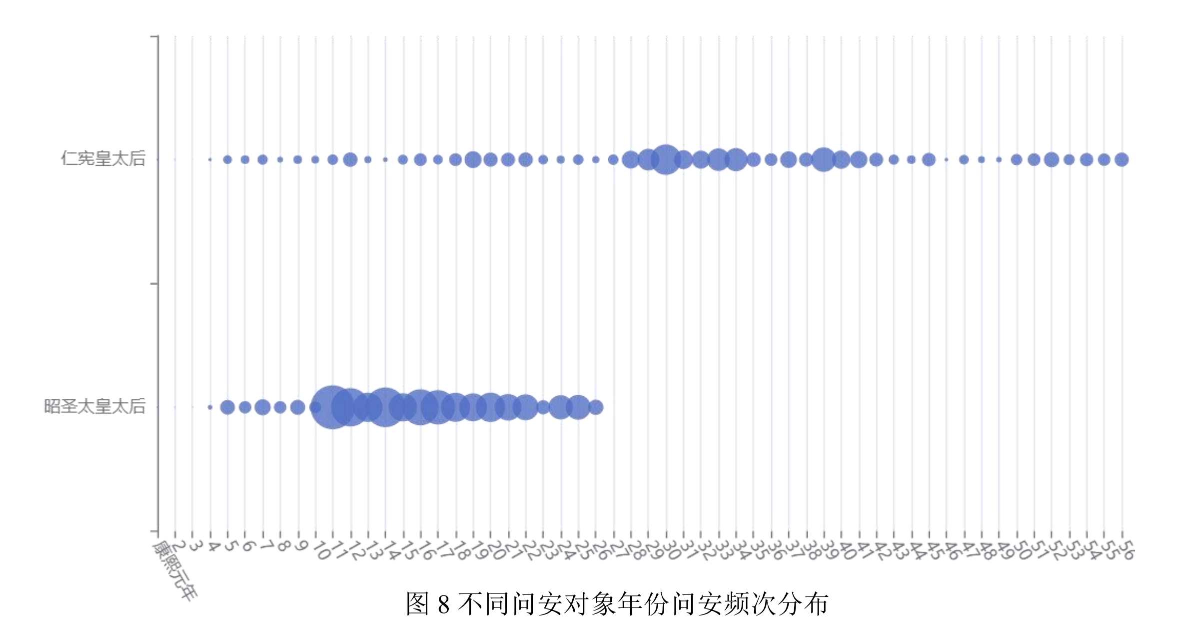


图 8 不同问安对象年份问安频次分布

昭圣太皇太后于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崩，而仁宪皇太后崩于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从年平均上来说，昭圣太皇太后的年平均问安次数约为 75 次，而仁宪皇太后约为 29 次。昭圣太皇太后尚未去世之前，后宫之中其实是以其为尊，仁宪皇太后虽然身居太后之位，但她每天都坚持给孝庄晨昏定省，即使孝庄认为不必如此，她仍旧坚持。结合康熙帝问安的频次，可以看出昭圣太皇太后于家于国都地位非凡。而因康熙帝生母早早离世，嫡母的存在让康熙有了孝亲的机会。康熙三十九年，仁宪皇太后六十岁大寿前夕，据《康熙实录》记载，“上令膳房数米一万粒，作万国玉粒饭及肴果品等物进献”。太后将饭分给孩子们吃，十分开心。另外，孝庄在世时，因热河避暑山庄尚未修建，故康熙帝没能让祖母孝庄来此佳地避暑，留下终生遗憾。康熙帝没能为祖母做的事，终于在嫡母身上实现。直到孝惠逝世前的八年，每逢入夏康熙帝都要奉皇太后去热河避暑。每次，康熙帝与嫡母一同离京，走到半路时，他率部分皇子、大臣先行，为嫡母到来做好一切准备。当孝惠皇太后到来之时，他率诸皇子、大臣出门跪接请安。康熙帝推崇孝道治天下，身先表率。仁宪皇太后虽并非其康熙生母，但康熙帝对她仍笃尽孝道，长期奉养于畅春园的“寿萱春永”，直到她去世。

4.4 康熙帝问安情境维度分析

4.4.1 康熙帝问安情境概况

经团队成员标注整理，《康熙起居注》中标注事件 50 类，共计 1631 起。《康熙实录》中标注事件 65 类，共计 2695 起。无论是《康熙起居注》还是《康熙实录》中，任免事件的占比均在位首，《康熙实录》记载任免事件 731 次，《康熙起居注》记载任免事件 392 次，这印证了清代人事变动频繁的说法。满族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国，要重建并有效统治这庞大而失序的帝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清帝王在满汉文化冲突和不同势力集团的矛盾中，努力维系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稳定局面，从而建设一个庞大的帝国，频繁的人事变动是防止结党营私的有效手段。要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必须淡化民族矛盾，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敬天法祖之外，还需要移孝作忠。敬天法祖是对帝王的要求，而移孝作忠是对臣子与民众的要求，二者相辅相成，皇帝为国为民，民众安分守己，则国泰民安。清代统治者，

作为异族帝王，最初不便在汉族民众中提倡忠君思想，于是“曲线救国”，改为大力提倡孝德，重视以孝道治天下。[31]事实上历史也证明该做法的成功实践，直接促成了康乾盛世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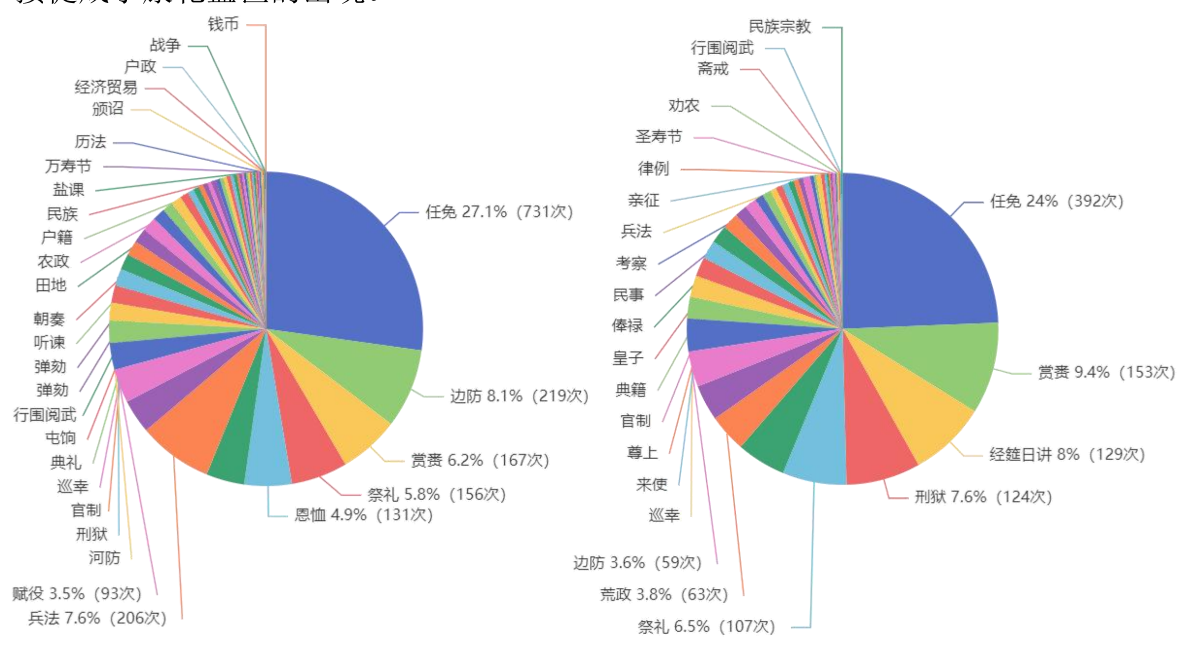


图 9 《清圣祖实录》载问安情境分布　　图 10《清圣祖起居注》载问安情境分布

4.4.2 重大事件下康熙帝问安文本分析

康熙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康熙帝嫡长子爱新觉罗·承祜夭折，年仅四岁。在康熙所有早殇诸皇子中，承祜是其最爱。据《康熙起居注》记载：“皇后所生长子承祜方四岁，天性聪慧，上甚爱之”。承祜能到康熙帝独爱，除其本身天性聪慧之外，还有其诞辰恰逢康熙帝智擒鳌拜后，其为中宫所生嫡子，其生母为赫舍里氏的皇后，而赫舍里氏中如索尼、索额图皆对皇室有功等因素。于康熙帝而言，承祜降生是极大的祥瑞，其夭折便是巨大的打击。但问安数据显示，即便历经丧子之痛，康熙仍然坚持前往问安，且在太皇太后面前笑语如常。《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二月初六日记载：“……皇子染病，于初五日巳时卒。上痛悼之。辰时，含痛诣太皇太后行宫问安，笑语如常”。问安结束后康熙对大臣说道：“朕恐太皇太后闻之伤悼，故含痛问安。”“礼部郎中仲古尔代等来奏安葬皇子事宜，至太皇太后行宫。上恐太皇太后闻知，召仲古尔代等至僻静处，近前垂泪面谕安葬事宜。”《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二月初七日记载：“……上自闻皇子信，常含痛诣太皇太后行宫问安，还则深居简出，郁闷不已。”在众大臣的安慰中康熙回道：“朕每日诣太皇太后宫问安，颇可自慰。既随太皇太后至温泉，如太皇太后圣躬豁然全安，朕不胜欢忭，稚子事，朕不介意。卿等所奏，朕知道了。”而据《康熙实录》康熙十一年二月辛巳记载：“……皇子承祜薨。上悼之。诣太皇太后行宫问安。笑语如常。出、谕内大臣觉罗塔达曰、恐太皇太后闻之伤悼、倘诸王等闻信、前来慰朕、俱令散去。”康熙十一年二月癸未记载：“……上自闻皇子信、郁闷不已。宗室公、内大臣等奏曰、皇上闻皇子之信、往往郁闷。臣等愿皇上移跸、借境舒怀。上曰、朕每日诣太皇太后行宫问安。颇可自慰 。既随太皇太后至汤泉、如太皇太后圣躬全安。朕不胜欢忭。稺子事、朕无甚介意”。历经伤痛仍坚持问安之礼，为安尊长之心而欢颜如常。可见，康熙帝之孝并非是一种制度性要求下的情非得已，而是一种出于本心的情到深处。

5 结语

康熙帝作为以孝治天下的典范帝王，不仅在政令推行，风俗教化等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尽显对孝之重视，其本人更是竭力为全民之典范，对祖母、生母与嫡母均克尽孝道。《康熙实录》载，康熙帝曾言道："人孰无祖父母、父母，为子孙皆当尽孝，何分贵贱？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根据研究结果，确能看出无论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人物维度亦或是情境维度，都充分体现出问安是康熙帝亲身施孝的示范性实践。

本文研究利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以康熙帝问安一事为切入点，以问安细节的数据化为基础，挖掘和分析《康熙起居注》《康熙实录》两部大体量历史档案中的问安记录，为清实录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借鉴。但本文的研究还只是局限于康熙帝一朝，无论在研究的纵向和深度方面，都需要作进一步扩展。另外，由于《康熙起居注》本身的部分内容缺失，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未来，本文作者团队将就更大时空范围、更广研究维度，以细颗粒数据为基础作进一步的系统探索。

参考文献

[1] 石山,陈文樵,许华利.湖北省辛亥革命历史档案资源的分布及利用[J].湖北档案,2011(10):7-11.
[2] 马克锋.刍议回族历史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J].办公室业务,2014(21):232-233.
[3] 王玉龙.基于案例分析的美国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网络开发与利用[J].档案与建设,2017(02):21-24.
[4] 高淞,王向女.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J].山西档案,2021(03):61-70.
[5] 王阮.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D].吉林大学,2021.
[6] 贾琼.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研究[D].吉林大学,2021.
[7] 朱政吉.由史料中探勘社会网络:以乾隆时期为例[D].台北:台湾政治大学,2008.
[8] 陈品谚.《清实录》之文本分析与时间标记初探[D].台北: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研究所,2011.
[9] 高欣愷.历史文件自动地名标注:以《清实录》为例[D].台北: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研究所,2013.
[10] 宋玉军.中国古代孝道文献综述[J].宁夏社会科学,2015(2):145-150.
[11] 阮元.孝经注疏.第 1 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5526.
[12] 王星月.浅谈清朝的"孝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9):235-236.
[13][14][15] 阮元.礼记正义:第 1 卷,第 20 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2667,3040.
[16] 中华书局.清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M].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
[17]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编辑说明. [EB/OL].[2022-09-22].http://iffxy086c8cca3aae450ahfuwuxp5ooop56quu.fgyg.libproxy.ruc.edu.cn/Web#/book/QSL.
[18] 何瑜.圆明园始建之年考辨[J].清史研究,2020(04):146-156.
[19]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3.
[20] 蒋赫德.《御定孝经注》[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
[21] 邓元锡.皇明书:第 41 卷[M].济南:齐鲁书社,1997:558.
[22] 阮葵生.茶余客话:第 5 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9.
[23]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 4 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8.
[24] 和珅,梁国治着.钦定热河志[M].校点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
[25] 张中乂.皇极殿·宁寿宫[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3):70-72+105-3.
[26] 中华书局. 清实录.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M].影印本. 中华书局.1987.
[27] 故宫博物院.慈宁宫.[EB/OL].[2022-10-10].https://www.dpm.org.cn/explore/building/236504.html.
[28] 贾珺.清代离宫御苑中的太后寝宫区建筑初探[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33-44.
[29] 李睿,赵连稳.三山五园的起始畅春园[J].北京观察,2018(06):76-80
[30] 杨剑利.清代畅春园衰败述略[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02):115-125+161.
[31] 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 2002:10.

作者贡献说明： 李少建：论文选题，论文框架，数据标注，论文撰写，论文修改
余　敏：数据标注，论文撰写，论文修改
罗　娜：数据标注，论文撰写
张佳欣：数据标注
王文斐：数据标注
梁继红：论文选题，论文指导

The Practice of Analysis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Taking *Kangxi Qi Ju Zhu* and *Kangxi Shi Lu* as an Example

Li Shaojian[1,2], Yu Min[1], Luo Na[1], Zhang Jiaxin[1], Wang Wenfei[1],Liang Jihong[1,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Historical archives are solidified information with original records formed by human being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y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Doing a good job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 resources is the key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val of China. [Method/proces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the data of Emperor Kangxi's greetings in the two historical archives of *Kangxi Qi Ju Zhu* and *Kangxi Shi Lu* are manually marked,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Emperor Kangxi's filial piety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is analyzed from the marked data results. [Result/Conclusion] Using the method of digital humanities to excavate and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two historical archives of *Kangxi Qi Ju Zhu* and *Kangxi Shi Lu*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archiv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will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Kangxi Qi Ju Zhu*;*Kangxi Shi Lu*;Historical Archives;Emperor Greetings;Culture of Filial Piety;Text Analysis;Digital Humanities